



溫故一九四二

温故一九四二

劉震云

温故一九四二

序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11
第三章	17
第四章	27
第五章	35
第六章	41
附錄	45

序

一九四二年，河南發生大災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盤黃豆芽和兩祇豬蹄，把我打發回了一九四二年。當然，這頓壯行的飯，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頓美味佳肴；同時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見得多麼可觀。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遜·福爾曼去河南考察災情，在母親煮食自己嬰兒的地方，我故鄉的省政府官員，宴請兩個外國友人的菜單是：蓮子羹、胡椒辣子雞、栗子炖牛肉、豆腐、魚、炸春卷、熱饅頭、米飯、兩道湯，外加三個撒滿了白糖的餡餅。這飯就是放到今天，我們這些庸俗的市民，也祇能在書中和大飯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說：這是他所吃過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說：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說：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鄉的省政府官員，決不會像白修德這麼扭扭捏捏。說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鄉發生了吃的問題。但吃的問題應該僅限在我們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計在我們這個東方文明的古國，無論發生什麼情況，縣以上的官員，都不會發生這種問題。不但不存在吃的問題，性的問題也不會匱乏。

還有一個問題，當我順著枯燥泛出黴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時，我發現五十年後我朋友把他交給我的任務的重要性，人為地夸大了。吃完豆芽和豬蹄，他是用

一種上校的口氣，來說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景象令人觸目驚心。全省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後，又遇蝗災。災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湯”，襲擊全省一百一十個縣。

災民吃草根樹皮，餓殍遍野。婦女售價累跌至過去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餓死三百萬人之多。

死了三百萬。他嚴肅地看著我。我心里也有些發毛。但當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時，我不禁啞然失笑。三百萬人是不錯，但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無非是小事一樁。在死三百萬的同時，歷史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宋美齡訪美、甘地絕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戰、丘吉爾感冒。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樁，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環境中，都比三百萬要重要。五十年之後，我們知道當年有丘吉爾、甘地、儀態萬方的宋美齡、斯大林格勒大血戰，有誰知道我的故鄉還因為旱災死過三百萬人呢？當時中國國內形勢，國民黨、共產黨、日軍、美國人、英國人、東南亞戰場、國內正面戰場、陝甘寧邊區，政治環境錯綜複雜，如一盆雜拌粥相互攪和，擺在國家最高元首蔣介石委員長的桌前。別說是委員長，換任何一個人，處在那樣的位置，三百萬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慮的問題。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所以，朋友交給我的任務是小節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當時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宮、唐寧街十號、克里姆林宮、希特勒的地下掩體指揮部、日本東京，中國最重

要的部分是重慶黃山官邸。這些富麗堂皇地方中的衣著干淨、可以喝咖啡洗熱水澡的少數人，將注定要決定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命運。但這些世界的軸心我將遠離，我要蓬頭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餓殍的河南災區。這不能說明別的，祇能說明我從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這些慌亂下賤的災民的后裔。最後一個問題是：朋友在爲我壯行時，花錢買了兩祇豬蹄。匆忙之中，他竟忘記拔下盤中豬蹄的蹄甲；我吃了帶蹄甲的豬蹄，就匆匆上路；可見雙方是多麼大意。

一

我姥娘將五十年前餓死人的大旱災，已經忘得一乾二淨。我說：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餓死許多人！”

姥娘：

“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歲。與這個世紀同命運。這位普通的中國鄉村婦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員。在她身上，已經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國歷史。沒有千千万萬這些普通的骯臟的中國百姓，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共產黨歷史都是白扯。他們是最終的災難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歷史歷來與他們無緣，歷史祇漫步在富麗堂皇的大廳。所以俺姥娘忘記歷史一點沒有慚愧的臉色。不過這次旱災餓死的是我們身邊父老鄉親，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記還是稍稍有些不對。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這牽涉到另一場中國災難——一九六零年。老人家性情溫和，雖不識字，却深明大義。我總覺中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仍給人以信心，是因為有這些性情溫和、深明大義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懷叵測、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著一位鄉村醫生，現在姥娘身體很好，記憶力健全，我母親及我及我弟弟妹

妹小時候的一舉一動，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記憶里。我相信她對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觸目驚心，而是在老人家的歷史上，死人的事確是發生得太頻繁了。指責九十二年許許多多的執政者毫無用處，但在哪位先生的執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經常、到處被活活餓死，這位先生確應比我姥娘更感到慚愧。這個理應慚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孫，決沒有發生飢餓。當我們被這樣的人統治著時，我們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嗎？但姥娘平淡無奇的語調，也使我的激動和憤怒平淡起來，露出自嘲的微笑。歷史從來是大而化之的。歷史總是被篩選和被遺忘的。誰是執掌篩選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蟲。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發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蟲。這一特定的標志，勾起了姥娘并沒忘却的蝗蟲與死人的聯系。她馬上說：

“這我知道了。原來是飛螞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螞蚱把地里的莊稼都吃光了。牛進寶他姑姑，在大油坊設香壇，我還到那里燒過香！”

我說：

“螞蚱前頭，是不是大旱？”

她點著頭：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還出不了螞蚱。”

我問：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個几十口吧。”

這就對了。一個村几十口，全省算起來，也就三百万了。我問:

“沒死的呢?”

姥娘:

“還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現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經不在了。二姥娘死時我依稀記得，一個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時我已二十多歲，記得是一顆蒼白的頭，眼瞎了，像狗一樣蜷縮在竈房的草鋪上。他的兒子我該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當過二十四年支書，從一九四八年當到一九七二年，竟沒有治下一座象樣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問: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沒有逃荒。東家對我好，我又去給東家種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厲害嗎?”

姥娘比著:

“怎麼不厲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澆一瓢水，‘滋滋’冒烟。”

這就是了。核對過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當過支書，大事清楚，我一問一九四二年，他馬上說: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樣?”

他吸著我的“阿詩瑪”烟說:

“一入春就沒下過雨，麥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塊顆粒無收；秧苗下種後，成活不多，活的也長尺把高，結不成籽。”

我:

“餓死人了嗎?”

他點頭:

“餓死几十口。”

我:

“不是麥收還有三成嗎？怎麼就讓餓死了?”

他瞪著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軍糧了？不交稅賦了？賣了田也不够納糧，不餓死也得讓縣衙門打死！”

我明白了。我問：

“你當時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歲吧。”

我：

“當時你干什麼去了？”

他：

“怕餓死，隨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儉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儉舅舅家在我們當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戶人家。我姥爺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長工。東家與長工，過從甚密；范克儉舅舅几個月時，便認我姥娘爲干娘。俺姥娘說，一到吃飯時候，范克儉他娘就把范克儉交給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褲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後，主子長工的身份爲之一變。俺姥娘家成了貧農，范克儉舅舅的爹在鎮反中讓槍斃了，范克儉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銀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說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沒享，就跟著受了几十年罪，圖個啥呢？因爲她與范克儉舅舅結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

與范家仍過從甚密。范克儉舅舅見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親眼見俺姥娘拿一塊月餅，像過去的東家對她一樣，大度地將月餅賞給叫“娘”的范克儉舅舅。范克儉舅舅臉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與范克儉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樹下（這顆槐樹，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憶一九四二年。一開始范克儉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爲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這時我想起他是前朝貴族，不該提四九年以後實行的公元制，便說是民國三十一年。誰知不提民國三十一年還好些，一提民國三十一年范克儉舅舅暴跳如雷：

“別提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壞得很。”

我吃驚：

“三十一年爲什麼壞？”

范克儉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燒了一座小樓！”

我不明白：

“爲什麼三十一年燒小樓？”

范克儉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嗎？”

我答：

“是呀，是大旱！”

范克儉舅舅：

“大旱后起螞蚱！”

我：

“是起了螞蚱！”

范克儉舅舅：

“餓死許多人！”

我：

“是餓死許多人！”

范克儉舅舅將手中的“阿詩瑪”烟扔了一丈多遠：

“餓死許多人，剩下沒餓死的窮小子就滋了事。挑頭的是毋得安，拿著几把大鋤、紅纓槍，占了俺家一座小樓，殺猪宰羊，說要起兵，一時來俺家吃白飯的有上千人！”

我爲窮人辯護：

“他們也是餓得沒辦法！”

范克儉舅舅：

“餓得沒辦法，也不能搶明火呀！”

我點頭：

“搶明火也不對，后來呢？”

范克儉舅舅詭秘地一笑：

“后來，后來小樓起了大火，麻杆浸著油。毋得安一幫子都活活燒死了，其它就做鳥獸散！”

“唔。”

是這樣。大旱。大飢。餓死人。盜賊蜂起。

與范克儉舅舅分手，我又與縣政協委員、四九年之前的縣書記坐在一起。這是一個高大的、衰敗的、患有不住擺頭症的老頭。雖然是縣政協委員，但衣服破舊，上衣前襟上到處是飯點和一片一片的油漬。雖是四合院，但房子破舊，瓦檐上長滿了枯黃的雜草。還沒問一九四二年，他對他目前的境況發了一通牢騷。不過我並不覺得這牢騷多麼有理，因爲他的鼎盛時期，是四九年之前當縣書記的時候。不過那時縣書記，不能等同于現在的縣委書記，現在的縣委書記是全縣上百万人的父母官，那時的縣書記祇是縣長的一個筆錄，何況那時全縣僅二十多万人。不過當我問起一九四二年，他馬上不發牢騷了，立即回到了年輕力壯的鼎盛時期，眼里發出光彩，頭竟然也不搖了。說：

“那時方圓几个縣，我是最年輕的書記，僅僅十八歲！”

我點頭。說：

“韓老，據說四二年大旱很厲害？”

他堅持不搖頭說：

“是的，當時有一場常香玉的賑災義演，就是我主持的。”

我點頭。對他佩服。因為在一九九一年，中國南方發水災，我從電視上見過賑災義演。我總覺得把那麼多魚龍混雜的演藝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沒想到當年的賑災義演，竟是他主持的。接著老人家開始敘述當時的義演盛況及他的種種臨時抱佛腳的解決辦法。邊說邊發出爽朗開心的笑聲。等他說完，笑完，我問：

“當時旱象如何？”

他：

“旱當然旱，不早能義演？”

我繞過義演，問：

“聽說餓死不少人，咱縣有多少人？”

他開始搖頭，左右頻繁而有節奏地搖擺。擺了半天說：

“總有個幾萬人吧。”

看來他也記不清了。幾萬人對於當時的筆錄書記，似也沒有深刻的記憶。我告別他及義演，不禁長出一口氣，也像他一樣搖起頭來。

這是在我故鄉河南延津縣所進行的旱

情採訪。據河南省志載，延津也是當時旱災最嚴重的縣份之一。但我這些採訪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準確的，五十年後，肯定夾雜了許多當事人的記憶錯亂和本能的按個人興趣的添枝或減葉。這不必認真。需要認真的，是當時《大公報》重慶版駐河南的戰場記者高峰的一篇報道。這篇報道採訪於當年，發表於當年，真實可靠性起碼比我的同鄉更真實可靠一些。這篇報道的標題是：《豫災實錄》。里邊不但描寫了旱災與飢餓，還寫到飢餓的人們在災難里吃的是什麼。這使我深深體會到，翻閱陳舊的報紙比到民間採訪陳舊的年頭便當多了。我既能遠離災難，又能吃飽穿暖居高臨下地對災難中的鄉親給予同情。

這篇報道寫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

△ 記者首先告訴讀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著那可憐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們形容豫災的淒楚字眼。

△ 河南今年（指舊歷，乃是一九四二年）大旱，已用不著我再說。“救濟豫災”這偉大的同情，不但中國報紙，就是同盟國家的報紙也印上了大字標題。我曾為這四個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頸翹望，絕望了的眼睛又發出了希望的

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時間久了，他們那餓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 河南一百十縣（連淪陷縣份在內），遭災的就是這個數目，不過災區有輕重而已，茲以河流來別：臨黃河與伏牛山地帶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

△ 河南是地瘠民貧的省份，抗戰以來三面臨敵，人民加倍艱苦，偏在這抗戰進入最艱難階段，又遭天災。今春（指舊歷）三四月間，豫西遭雹災，遭霜災，豫南豫中有風災，豫東有的地方遭蝗災。入夏以來，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災。豫西一帶秋收之蕎麥尚有希望，將收之際竟一場大霜，麥粒未能灌漿，全體凍死。八九月臨河各縣黃水溢堤，汪洋泛濫，大旱之後復遭水淹，災情更重，河南就這樣變成人間地獄了。

△ 現在樹葉吃光了，村口的柞白，每天有人在那里搗花生皮與榆樹皮（祇有榆樹皮能吃），然後蒸著吃。在叶縣，一位小朋友對我

說：“先生，這家伙刺嗓子！”

△ 每天我們吃飯的時候，總有十几二十几个災民在門口鵠候號叫求乞。那些菜綠的臉色，無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沒有那些剩飯給他們。

△ 今天小四飢死了，明天又聽說友來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見小寶凍死在塞外。可憐那些還活潑亂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陸續的離開了人間。

△ 最近我更發現災民每人的臉都浮腫起來，鼻孔與眼角發黑。起初我以為是因餓而得的病症。後來才知是因為吃了一種名叫“徽花”的野草中毒而腫起來。這種草沒有一點水分，磨出來是綠色，我曾嘗試過，一股土腥味，據說豬吃了都要四肢麻痺，人怎能吃下去！災民明知是毒物，他們還說：“先生，就這還沒有呢！我們的牙臉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現在叶縣一帶災民真的沒有“徽花”吃，他們正在吃一種干柴，一種無法用柞白搗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腫臉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

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 牛早就快殺光了，豬盡是骨頭，雞的眼睛都餓得睜不開。

△ 一斤麥子可以換二斤豬肉，三斤半牛肉。

△ 在河南已恢復了原始的物物交換時代。賣子女無人要，自己的年輕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都馱到驢上到豫東馱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賣一口人，買不回四斗糧食。麥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饅八元一斤，鹽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沒有救災辦法，糧價不會跌落的，災民根本也沒有吃糧食的念頭。老弱婦孺終日等死，年輕力壯者不得不鋌而走險，這樣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災了，而需要清鄉防匪，維持地方的治安。

△ 嚴冬到了，雪花飄落，災民無柴無米無衣無食，凍餓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徵著他們的命運。救災刻不容緩了。

二

重慶黃山官邸。這裡生機盎然，空氣清新，一到春天就是滿山的桃紅和火焰般的山茶花。自南京陷落以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這裡是蔣介石委員長的住處。當時蔣在重慶有四處官邸，這是其中之一。領袖的官邸，與國家淪陷、國家強弱沒有關係；這裡既不比南京的几處官邸差，也不比美國的白宮、英國的唐寧街十號遜色。領袖總是領袖，祇要能當上領袖，不管當上什麼膚色、民族的領袖，都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衣、食、住、行。雖然所統治的民衆大相徑庭。所以，我歷來贊成各國領袖之間握手言歡，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的階級兄弟；各國民衆之間，既不必聯合，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即使發生戰爭，也不可怕，世界上最后一顆炮彈，才落在領袖的頭上。如果發生世界性的核戰爭，最后剩下的，就是各國的几位領袖，因為他們這時住在風景幽美的地球上空，掌握著核按鈕。掌握按鈕的人，歷來是不會受傷害的。黃山官邸以云岫樓和松廳為中心結構，蔣住云岫樓，儀態万方的宋美齡住松廳。當然，夜間就難說了，如果兩人有興致的話。在兩處住宅之間的低谷里，專門挖有防空洞，供蔣、宋躲他們階級兄弟日本天皇陛下的飛機。至于蔣、宋的日常生活，這不是我們所能想象的，反正整日的吃喝，比五十年後我們十二億人中的十一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人還要好，還要不可想象。雖然蔣祇喝白水，不飲酒、不抽煙、安假牙，

信基督，但他也肯定知道，榆樹皮和“徽花”，是不可吃的，可吃的是西餐和中餐中的各种菜系。一九四二年，蔣與他的參謀長、美國人史迪威發生矛盾，在黃山官邸吵嘴，即要不歡而散，宋美齡挽狂瀾于即倒，美麗地笑著說：“將軍，都是老朋友了，犯不著這樣愜氣。要是將軍能賞光到我的松廳別墅去坐一坐，將會喝到可口的咖啡！”

這是我在一本書上讀到的。讀到這裡，我對他們吵不吵嘴並不感興趣，反正吵嘴的雙方都已經去球了，不在這個世界上了。我注意到：一九四二年，中國還是有“可口的咖啡”，雖然我故鄉的人民在吃樹皮、柴火、稻草和使人身體中毒發腫的“徽花”，最后餓死三百萬人。當然，這樣來故意對比，說明我這個人無聊，把什麼事情都弄得庸俗化。我也知道，對一個泱泱大國政府首腦的要求，不在他的夫人有無有咖啡，祇要他們每天不喝人血（據說中非的皇帝就每天喝人血），無論喝什麼，吃什麼，祇要能把國家治理好，就是一個民族英雄和歷史偉人。我在另一本書上看到，蔣為了拉攏一部地方武裝，對戴笠說：“你去辦一辦。記住，多花几个錢沒關係。”這錢從何而來呢？我祇是想說，一九四二年，當我故鄉發生大旱災、大飢餓的消息傳到黃山官邸時，蔣委員長對這消息不該不相信。當然，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全信，他說：可能有旱災，但情況不會這麼嚴重。他甚至懷疑是地方官員虛報災情，像軍隊虛報兵員為了吃空額一樣，想多得一些救濟糧和救濟款。蔣委員長的這種態度，在几十年後的今天，受到許多書籍的指責。他們認為委員長不體察民情、不愛民如子、固執等。他們這種愛民如子、橫眉冷對民賊獨夫的態度，也感

染了我的情緒。但當我冷靜下來，我又是輕輕一笑。這時我突然明白，該受指責的不是委員長，而是几十年后這些書的自作聰明的作者。是侍從在夢中，還是丞相在夢中？侍從在夢中。不設身處地，不身居高位，怎麼能理解委員長的心思？書籍的作者，不都是些百無一用的書生嗎？委員長是委員長都當上了，頭腦不比一個書生聰明？是書生領導委員長，還是委員長領導書生？是委員長見多識廣，還是書生見多識廣？一切全在委員長——萬般世界，五萬萬百姓，皆在委員長心中。祇是，當時的委員長的所思所想，高邈深遠，錯綜複雜，并不被我們所理解。委員長真不相信河南有大旱災、旱災會餓死人嗎？非也。因為從委員長的出身考察，相對於宋美齡小姐來說，委員長還算是苦出身。委員長自己寫道：

我九歲喪父……。當時家里的悲慘情況實在難以形容。我家無依無靠，沒有勢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對象。

這樣一個出身的人，不會不知道下層大眾所遭受的苦難。在一個省的全部範圍內發生了大旱災，情況嚴重到什麼程度，他心里不會沒底。但他認為：可能有旱災，但不會這麼嚴重。于是書生們上了當，以為委員長是官僚主義。其實在夢中的是書生，清醒的是委員長。那麼為什麼心里清楚說不清楚呢？明白情況嚴重而故意說不嚴重呢？這是因為擺在他面前的，有更多的，比這個旱災還嚴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處理妥當以致不犯歷史錯誤的重大問題。須知，在東方餓死三百万人不會影響歷史。

這時的委員長，已不是一個鄉巴佬，而是一個領袖。站在領袖的位置上，他知道輕重緩急。當時能導致歷史向不同方向發展的事情大致有：

一、 中國的同盟國地位問題。

當時同盟國有美、英、法、蘇、中等。蔣雖是中國的領袖，但同盟國的領袖們坐在一起開會，如開羅會議，蔣就成了一個普通人，成了一個小弟兄，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大家在一起，似乎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都不把蔣放在眼里。不把蔣放眼裡，就是不把中國放到眼里。由此以來，在世界戰局的分布上，中國就常常是戰略的受害者。而中國最窮，必須在有外援的情況下才能打這場戰爭，所以常常受制于人，吃啞巴虧；帶給蔣個人的，就是仍受“侮辱和虐待”。這是他個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

二、 對日戰爭問題。在中國正面戰場，蔣的軍隊吸引了

大部分在華日軍，雖然不斷丟失土地，但從國際戰略上講，這種牽制本身，就給其它同盟國帶來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國其它領袖并沒認清這一點或是認清了這一點而故意欺辱人，

所給的戰爭物資，與國民黨部隊所擔負的牽制任務，距離相差非常大；從國內講，國民黨部隊在正面戰場牽制日軍，使得共產黨在他的根据地得到休養生息，這是蔣的心腹大患，于是牽涉到了對共產黨的方針。蔣有一著名的理論，“攘外必先安內”。這口號從民族利益上講，是狹隘的，容易激起民憤的；如果從蔣的統治利益出來，又未嘗不是一個統治者必須採取的態度。如祇是攘外，后方的敵人發展起來，不是比前方的敵人更能直搗心臟嗎？關於這一方針，他承受著巨大的國際、國內壓力。

三、國民黨內部、國民政府內部各派系的鬥爭。蔣曾很後悔地說：北伐戰爭之后，他不該接受那麼多軍閥部隊；一九四九年后說：我不是被共產黨打倒的，我是被國民黨打倒的；可見平日心情。四、他與他的參謀長——美軍上將史迪威將軍，發生了嚴重的戰略上和個人間的矛盾，這牽涉到對華援助和蔣個人在美國的威信問題。史迪威已開始在背后不體面地稱這位中國民族的領袖為

“花生米”——以上所有這些問題，包括一些我們還沒覺察到而蔣在他的位置上已經覺察到的問題，都有可能改變歷史的方向和寫法，這時，出現了一個地方省（當時全國三十多個省）的旱災，顯得多麼無足輕重。死掉一些本就無用、是社會負擔的老百姓，不會改變歷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層政治的重大問題上處理稍有不慎，歷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發展，后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就證明了這一點。上述哪一個重大問題，對於一個領袖來講，都比三百萬人對他及他的統治地位影響更直接，更利益交關。從歷史地位上說，三百萬人確沒有一粒“花生米”重要。所以，他心里清楚旱災，仍然要說：可能有旱災，但不會那麼嚴重。于是他厭惡那些把他當傻瓜當官僚以為他不明真相而不厭其煩向他提供真情況的人，特別是那些愛管閑事、愛干涉他國內政的外國人。這就是蔣委員長此時此刻的心境。當然，這是站在蔣的立場上考察問題；如果換一個角度，當我們站在几千万災民的立場上去考察，就覺

得蔣無疑是獨夫民賊，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顧了。

世界有這樣一條真理，一旦與領袖相處，我們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黜不可。蔣的這種態度，使受災的几千万人祇有吃樹皮、稻草、干柴和“徽花”，而得不到一個政府所應承擔的救濟，調劑和幫助。于是，人口在大面積死亡。但這不是事情最重要的部分，事情最重要的部分是：

在大面積受災和餓死人的情況下，政府向這個地區所征的實物稅和軍糧任務不變。

陳布雷說：

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地”“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并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能緩免。

這實際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與災害為伍，在直接宰殺那些牲口一樣的兩眼灰蒙蒙、東倒西歪的災民。于是，死的死了；沒死的，發生大面積背井離鄉的逃荒。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們也會像蔣委員長那樣說：情況不會那麼嚴重吧？這是一種事物的慣性，事物后特別過很長一段時間后再來想事物，我們總是寬宏大量地想：事情不會那麼嚴重吧？但在當時，可知歷史是一點不寬容的。爲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又得引用資料。我認爲這種在歷史中打撈事件的報告式的文字，引用資料比作者胡編亂造要更科學一些。后者雖然能使讀

者身臨其境，但其境是虛假的；資料也可能虛假，但五十年前的資料，總比五十年后的想象更真實一些。一九四二年，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

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加重的實物稅和征收軍糧。由于在中條山失陷之前，該省還要向駐守山西南部的軍隊和駐守在比較窮困的陝西省的軍隊提供給養，因而，負擔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陝西省的四十萬駐軍的主要任務是“警戒”共產黨。

我從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計是：全部所征糧稅占農民總收穫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稅，全國性的實物土地稅（通過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無法估計的軍事方面的需求。稅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當年的實際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壞，從農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糧要繳納小麥，因此，他們所收穫的小麥更大一部分要用于納糧。

有很可靠的證據表明，向農民征收的軍糧是超過實際需要的。中國軍官的一個由來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慣例，就是向上級報告的部隊人數超過實際所有的人數。這樣他們就可以吃空額，謀私利。洛陽公開市場上的很大一批糧食，就是來自這個方面……

人們還普遍抱怨，征糧征稅負擔分配不公平。這些事是通過保甲長來辦，他們自己就是鄉紳、地主。他們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們的親朋好友不要納糧納稅太多。勢力還是以財富和財產為基礎：窮苦農民

的糧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這就正像是他們的兒子，而不是甲長和地主的兒子，被拉去當兵一樣。

河南的情況是如此之糟，以致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陝西、甘肅和川北……。結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對減少，而留下來的，人和賦稅負擔相對加重了。在前綫地區，農民的日子最苦，那里受災也最重。因此，來自那里的人口流動也最多。來自鄭州的一位傳教士說，早在當年的飢荒襲來之前，那個地區的許多田園就已荒無人烟了。

這種情況今年發展到了頂點。最盲目的政府官員也認識到，在小麥欠收后，早春將發生嚴重缺糧。早在七月間，每天就有約一千名難民逃離河南，但是，征糧計劃不變。在很多地區，全部收成不夠納糧的需要。在農村發生了一些抗議，但都是無力的，分散的，沒有效果的。在少數地方，顯然使用了軍隊對付人民。吃著榆樹皮和干樹葉的災民，被迫把他們最後一點糧食種子交給稅收機關。身體虛弱得幾乎走不動路的農民還必須給軍隊交納軍馬飼料。這些飼料比起他塞進自己嘴里的東西，其營養價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謝偉思的報告。為什麼我引用謝的文字而不引證別的書籍呢？因為謝是外國人，不身在復雜的其中，也許能更客觀一些。但謝偉思所說的，還不是最嚴重的，即：在災難中的災民，並不被免除賦稅，而是嚴令仍按正常年景稅賦征收因而實際上稅賦已超過正常年景還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統治這些災民的一些官員，還借災民的災難去投機發財。據美國記者白

修德親眼目睹，有些部隊的司令把部隊的余糧賣給實民，發了大財。來自西安和鄭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吏、軍官以及仍然儲蓄著糧食在手的地主，拼命以罪惡的低價收買農民祖輩留下來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喪失同時進行，其激烈程度與飢餓的程度成正比。

當我們被這麼一些從委員長一直到小官吏、地主所統治的時候，我們的命運操縱在他們手里，我們對他們的操縱能十分放心嗎？

後來，就必然出現了大批的脫離了土地的災民，出現一個由東向西的大規模的流民圖。這流民中，就包括河南延建縣王樓鄉老莊的俺二姥娘、俺三姥娘全家，包括村里其它許多父老鄉親。他們雖然一輩子沒有見過委員長，許多青壯年一聽委員長還自覺立正，但是，委員長在富麗堂皇的黃山別墅的態度，一顰一笑，都將直接決定他們的生死和命運。委員長思索：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他們思索，我們向哪里去逃荒？

三

重慶黃山官邸。這裡生機盎然，空氣清新，一到春天就是滿山的桃紅和火焰般的山茶花。自花爪舅舅直到現在還有些後悔。當初在洛陽被抓了壯丁，後來為什麼要逃跑，沒有在部隊堅持下來呢？我問：

“當時抓你的是哪個部隊？”

花爪舅舅：

“國軍。”

我：

“我知道是國軍，國軍的哪一部分？”

花爪舅舅：

“班長叫個李狗剩，排長叫個閆之棟。”

我：

“再往上呢？”

花爪舅舅：

“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我事後查查資料，當時占據洛陽一帶的國民黨部隊，隸屬胡宗南。我問：

“被抓壯丁後幹什麼去了？”

花爪舅舅：

“當時就上了中條山，派到了前線。日本人的追擊炮，‘啾啾’地在頭上飛。打仗頭一天，班副和兩個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當晚就開溜了。現在想起來，真是後悔。”

我：

“是呀，大敵當前，民族矛盾，別的弟兄犧牲了，你開溜了，是不大象話，該後悔。”

花爪舅舅瞪我一眼：

“我不是後悔這個。”

我一愣：

“那你後悔什麼？”

花爪舅舅：

“當初不開溜，後來跑到台灣，現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小名強驢，抓壯丁比我還晚兩年，後來到了台灣，現在成了台胞，去年回來了，帶著小老婆，戴著金殼手表，鑲著大金牙，縣長都用小轎車接他，是玩的不是？這不能怪別的，祇能怪你舅眼圈子太小，年輕不懂事。當時我才十五六歲，祇知道活命了。”

我明白了花爪舅舅的意思。我安慰他：

“現在後悔是對的，當初逃跑也是對的。你想，一九四三年，離抗日戰爭結束還有兩年，以後解放戰爭還有五年，誰也難保證你在諸多的戰鬥中不像你們班副一樣被打死。當然，如果不打死，就像強驢一樣成了台胞；如果萬一打死，不連現在也沒有了。”

花爪舅舅想了想：

“那倒是，子彈沒長眼睛；我就是這個命，咱沒當台胞那個命。”

我說：

“你雖然沒當台胞，但在咱們這邊，你也當了支書，總起說混得還算不錯。”

花爪舅舅立即來了精神：

“那倒是，支書我一口氣當了二十四年！”

但馬上又頹然嘆口氣：

“但是十個支書，加起來也不頂一個台胞呀。現在又下了台，縣長認咱是誰呀。”

我安慰他：

“認識縣長也沒什麼了不起，不就是一個強驢嗎？舅舅，咱們不說強驢了，咱們說說，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當初是怎麼逃荒的，你身在其中，肯定有許多親身經歷。”

一說到正題，花爪舅舅的態度倒變得無所謂，敘述得也簡單和枯燥了。兩手相互抓著說：

“逃荒就是逃荒唄。”

我：

“怎麼逃荒，荒怎麼逃法？”

他：

“俺爹推著獨輪車，俺二大爺挑著籬筐，獨輪車上裝些鍋碗瓢盆，籬筐里挑些小孩。路上拉棍要飯，吃樹皮，吃雜草。後來到了洛陽，我就被抓了兵。”

我不禁埋怨：

“你也說得太簡單了，路上就沒有什麼現在還記得的事情？”

他眨眨眼：

“記得路邊躺著睡覺特冷，半夜就凍醒了。見俺爹俺娘還在睡，也不敢說話。”

我：

“後來怎麼抓的兵？”

他：

“洛陽有天主教辦的粥場，我去擠著打粥，回來路上，就被抓了兵。”

我：

扒火車還軋死許多。”

“抓兵俺三姥爺三姥娘知道不？”

我：

他搖搖頭：

“咱家沒有餓死的？”

“他們哪里知道？認為我被人拐跑了。
再見面就是十年之后了。”

他：

我點點頭。又問：

“怎麼沒有餓死的，你二姥爺，你三姑，
不都是餓死在道兒上？”

“你抓兵他們怎麼辦？”

我：

他：

“就沒有一些細節？”

“十年后我才聽俺娘說，他們扒火車去
陝西。扒火車時，俺爹差點讓火車軋著。”

這時花爪舅舅有些不耐煩了，憤怒地
瞪我一眼：

我：

“人家人都餓死了，你還要細節！”

“俺二姥娘家一股呢？”

他：

“你二姥爺家扒火車時，扒著扒著，火
車就開了，把個沒扒上來的小妹妹——你
該叫小姨，也給弄失散了，直到現在沒找
見。”

說完，丟下我，獨自蹣跚地走了，把
我扔在一片尷尬之中。這時我才覺得朋友
把我打發回一九四二年真是居心不良，我
在揭親人和父老的已經愈合五十年的傷疤，
讓他們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創面；何況這疤
癬也結得太厚，被歲月和灰塵風干成了盔
甲，搬動它像搬動大山一樣艱難費勁。

我點點頭。又問：

沒有風，太陽直射在一大溜麥秸垛上。
麥秸垛旁顯得很溫暖。我蹲在麥秸垛旁，正
費力地與一個既聾又瞎話語已經說不清楚
且鼻涕流水的八十多歲的老人說話。老人
叫郭有運。據縣政協委員韓給我介紹，他
是一九四三年大逃荒中家中受損失最重
的一個。老婆、老娘、三個孩子，全丟在了路
上。五年后他從陝西回來，已是孤身一人。

“路上死人多嗎？”

他：

“怎麼不多，到處是墳包，到處是死人。

現在的家庭，屬於重起爐竈。但看麥秸垛后他重搭的又經營四十多年的新爐竈，證明他作為人的能力，還屬上乘。因為那是我故鄉鄉村中目前還不常見的一幢不中不西的二層小樓。但如果從他年齡過大而房子很新的角度來考察，這不應算是他的能力，成績應歸功于坐在我們中間當翻譯的留著分頭戴著“戈爾巴喬夫”頭像手表的四十歲的兒子。他的兒子一開始對我的到來並不歡迎，祇是聽說我與這個鄉派出所的副所長是光屁股同學，才對我另眼相看。但聽到我的到來與現實中的他沒有任何關聯，而是為了讓他爹和我共同回到五十年前，而五十年前他還在風里云里飄，就又有些不耐煩。老人家的嘴漏風，鳴里鳴啦，翻譯不耐煩，所得的五十年前的情況既生硬又零碎。我又一次深深體會到，在活人中打撈歷史，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有運在一九四三年逃荒中的大致情況是：一上路，他娘就病了；為了給他娘治病，賣掉一個小女；為賣這個小女，跟老婆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不單純是賣女心疼，而是老婆與婆婆過去積怨甚深，不願為治婆婆的病賣掉自己的骨肉。賣了小女，娘的病也沒治好，死在黃河邊，軟埋（沒有棺材）在一個土窖里。走到洛陽，大女患天花，病死在慈善院里。扒火車去潼關，兒子沒扒好，掉到火車輪下給軋死了。剩下老婆與他，來到陝西，給人攔地放羊。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個人拐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麥秸垛前，他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攤著手：

“我逃荒為個啥？我逃荒為圖大家有個活命，誰知逃來逃去剩下我自己，我還逃荒干什麼？早知這樣，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還能死到一塊，這死得七零八落的。”

這段話他兒子翻得很完全。我聽了以后也感到是一個怪圈。我弄不明白的還有，現在不逃荒了，郭有運的新家有兩層小樓，為什麼還穿得這麼破衣爛衫，仍像個逃荒的樣子呢？如果不是老人家節儉的習慣，就是現實中的一切都不屬於他。這個物質幸福的家庭，看來精神上並不愉快。這個家庭的家庭關係沒有或永遠沒法理順。我轉過頭對他兒子說：“老人家也不易，當年逃荒那個樣子！”

誰知他兒子說：

“那怪他窩囊。要讓我逃荒，我決不會那麼逃！”

我吃了一驚：

“要讓你逃，你怎麼逃？”

他兒子：

“我根本不去陝西！”

我：

“你去哪兒？”

他兒子：

“我肯定下關東！關東不比陝西好過？”

我點頭。關東肯定比陝西富庶，易于人活命。但我考察歷史，我故鄉沒有向關東逃荒的習慣：闖關東是山東、河北人的

事。我故鄉遇災遇難，流民路線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雖然西邊也像他的故鄉一樣貧瘠。當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還有一個特殊情況，就是東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去了是去當亡國奴。我把這后一條理由向他兒子談了，誰知他一揮手上的“戈爾巴喬夫”，發出驚人論調：

“命都顧不住了，還管地方讓誰占了？向西不當亡國奴，但他把你餓死了。換你，你是當亡國奴好呢，還是讓你餓死呢？不當亡國奴，不也沒人疼你愛你管你嗎？”

我默然，一笑。他提出的問題我解答不了。我想這是蔣委員長的失算，及他一九四九年逃到台灣的深刻原因。假如我處在一九四二年，我是找不管不聞不理不疼不愛我的委員長呢，還是找還能活命的東北關外呢？

告別郭有運和他的兒子，我又找到十李莊一位姓蔡的老婆婆。但這次採訪更不順利，還沒等我與老婆婆說上話，就差點遭到她兒子的一頓毒打。姓蔡的老婆婆今年七十歲，五十年前，也就二十歲。在隨爹娘與兩個弟弟向西逃荒時，路上夜里睡覺，全家的包袱、細軟、盤纏、糧食，全部被人席卷一空。醒後發現，全家人祇好張著傻嘴大哭。再向西逃沒有活咱。她的爹娘祇好把她賣掉，保全兩個弟弟。一開始以為賣給了人家，但人販子將她領走，轉手又倒賣給窑子，從此做了五年皮肉生涯。直到一九四八年，國共兩黨的軍隊交戰，隆隆炮聲中，她逃出妓院，逃回家鄉，像郭有運老漢一樣，她現在的家庭、兒子、女兒一大家人，都是重起爐竈另建立的。她五

年的骯臟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除非鄰里吵架時，被別的街坊娘們重新抖落一遍。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她的這段生活，突然又顯示出它特有的價值。本地的、外地的一些寫暢銷書的人，都覺得她這五年歷史有特殊的現實意義，紛紛來採訪她，要以她五年接客的種種情形，寫出一本“我的妓女生涯”的自傳體暢銷書。從這題目看，暢銷是必然的。為多寫字的來採訪，一開始使這個家庭很興奮，原來母親的經歷還有價值，值得這些衣著干淨人的關心。大家甚至感到很榮耀。但時間一長，當兒女們意識到寫字的關心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關心他們自身，而是為了拿母親的骯臟經歷去為自己賺錢，于是她的兒女們，這些普普通通的莊稼人，突然感到自己受了騙，受了污辱。于是對再來採訪的人，就怒目而視。為此，他們洋洋自得仍興奮地沉浸在當年情形中的母親，受到了她的兒子們嚴厲斥責。母親從此對五十年前的事情又守口如瓶：已經說過的，也斷然反悔。這使已經寫下許多文字的人很尷尬。“我的妓女生涯”也因此夭折。這樁公案已經過去好几年了，現在我到這裡來，又被她的兒子認為是來拿他母親的骯臟經歷賺錢的，要把已經夭折的“妓女生涯”再搭救起來。因此，我還沒能與老婆婆說上話，他兒子的大棒，已差點落到我的頭上。我不是一個多麼勇敢的人，祇好知難而退。而且我認為為了寫這篇文章，去到處揭別人傷疤，特別是一個老女人骯臟的膿瘡時，確實不怎麼體面。我回去告訴了在鄉派出所當副所長的我的小學同學，沒想到他不這麼認為，他怪我祇是方式不對。他甩了甩手里的皮帶說：

“這事你本來就應該找我!”

我:

“怎麼，你對這人的經歷很清楚?”

他:

“我倒也不清楚，但你要清楚什麼，我把她提來審一下不就完了?”

我吃一驚，忙擺手:

“不採訪也罷，用不著大動干戈。再說，她也沒犯罪，你怎麼能說提審就提審!”

他瞪大眼珠:

“她是妓女，正歸我打擊，我怎麼不可以提審?”

我擺手:

“就是妓女，也是五十年前，提審也該那時的國民黨警察局提審，也輪不到五十年后的你!”

他還不服氣:

“五十年前我也管得著，看我把她抓過來!”

我忙攔住他，用話岔開，半天，才將氣呼呼的他勸下。離開他時，我想，同學畢竟是同學呀。

爲了把這次大逃荒記述下去，我們祇好再次借助于《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文章寫到這裡，我已清楚地意識到，白修德，必將成爲這篇文章的主角，這不是因爲別的，是因爲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災荒，已經沒有人關心。當時的領袖不關心，政府不關心，各級官員在倒賣糧食發災難財，災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沒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災民，也對當年處以漠然的態度。這時，唯一一個外國人，《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倒在關心著這片飢荒的土地和三百萬餓死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這樣的態度，自己的事情讓別人關心、同情，說起來讓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臉紅。當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爲了關心我們的民衆，他是出于一個新聞記者的敏感，要在大災荒里找些可寫的東西。無非是在找新聞的時候，悲慘的現實打動了他，震撼了他，于是產生了一個正常人的同情心，正義感，要爲之一呼。這就有了以后他與蔣介石的正面衝突。說也是呀，一個美國人可以見委員長，有幾個中國人，可以見到自己的委員長呢？怕是連政府的部長，也得事先預約吧。我們這些無依無靠的災民，像自己父母一樣的各級官員我們依靠不得，祇好依靠一個其它力量并不強大的外國記者了。特別是後來，這種依靠也起了作用，這讓五十年后的我深受震動、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歷史》的書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同行者是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林·福爾曼。在這篇文字開頭我曾說到，在他們到達鄭州時，曾在我的家鄉吃過一頓“他能吃過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們當時的行走路線是；從重慶飛抵寶雞，剩隴海綫火車從寶

雞到西安，到黃河，到潼關，然後進入河南。爲防日本人炮擊，從潼關換乘手搖的巡道車，整整一天，到達洛陽。所走的正是難民逃難的反方向。到達河南後，騎馬到鄭州，然後由鄭州搭乘郵車返回重慶。從這行走路綫看，是走馬觀花，祇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記下的，都是沿途隨時的所見所聞。這些所見是零碎的，所談的見解帶有很大的個人見識性。何況中美國情不同，這種個人見解離實際事務所包含的真正意蘊，也許會有一段距離。但我們可以爲開這些見識，進入他的所見，進入細節；他肉眼看到的路邊事實，總是真實的。我們可以根据這些真實的事實，去自己見識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災民大逃荒。我試圖將他這些零碎的見聞能歸納得條理一些。

一、災民的穿戴和攜帶。災民逃出來時，穿的都是他們最好的衣服，中年婦女穿著紅顏綠色的舊嫁衣，雖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帶的是他們家中最有價值的東西，燒飯鉄鍋，鋪蓋，有的還有一座老式座鐘。這證明災民對自己的故鄉已徹底失去信心，沒有留戀，決心離開家鄉熱土，連時間——座鐘都帶走了。白修德與他的伙伴在潼關車站睡了一夜。他說，那里到處是尿臊味、尿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爲了御寒，許多人頭上裹著毛巾，有的帽子把帽耳朵放下來。他們在這里的目的，是爲

了等待往西去的火車，雖然這種等待是十分盲目的。

二、逃荒方式。不外是扒火車和行走。扒火車很不安全。白修德說，他沿途見到許多血迹斑斑的死者。一種是扒上了火車，因列車被日本人的炮彈炸毀而喪命；有的是扒上了車廂頂，因夜里手指凍僵，失去握力，自己從車廂頂摔下摔死的；還有的是火車沒扒上，便被行走的火車軋死的。軋死還好些，慘的是那些軋上又沒軋死的。白見到一個人躺在鉄軌旁，還活著，不停地喊叫，他的小腿被軋斷，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杆那樣露在外面。他還見到一個臀部軋得血肉模糊還沒死去的人。白修德說，流血並不使他難過，難過的是弄不明白這些景象究竟是怎麼回事。這麼無組織無紀律的遷徙，他們各級政府哪里去了？——這證明白修德太不了解中國國情了。扒不上火車或對火車失望的，便是依靠自己的雙腿，無目的無意識地向西移動。白修德說，整整一天，沿著鉄路綫，“我見到的便是這些由單一的、一家一戶所組成的成群結隊一眼望

不到頭的行列。”這種成群結隊是自發的、無組織的，祇是因爲飢荒和求生的欲望，才使他們自動地組成了災民的行列。可以想象，他們的表情是漠然的，他們也不知道，前邊等待他們的是什麼。唯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便是他們自己心中對前方未來的希望。也許能好一些，也許熬過這一站就好了。這是中國人的哲學，這又是白修德所不能理解的。災民的隊伍在寒冷的氣候中行走。不論到哪里，祇要他們由于飢寒或筋疲力盡而倒下，他們就再也起不來了。獨輪車裝著他們的全部家當，當爹的推著，當娘的拉著，孩子們跟著。纏足的老年婦女蹣跚而行。有的當兒的背著他們的母親。在路軌兩旁艱難行走。在行列中，沒有人停頓下來。如果有孩子伏在他的父親或母親的屍體上痛哭，他們會不聲不響地從他身旁走過。沒有人敢收留這啼哭的孩子。

三、賣人情況。逃荒途中，逃荒者所帶的不多的糧食很快就會被吃光。接著就吃樹皮、雜草和干柴。白邊走邊看到，許多人在用刀

子、鐮刀和菜刀剝樹皮。這些樹據說都是由愛好樹木的軍閥吳佩孚栽種的。榆樹剝皮后就會枯死。當樹皮、雜草、干柴也沒得吃時，人們開始賣兒賣女，由那些在家庭中處於支配地位的人，去賣那些在家庭中處於被支配地位的人。這時同情心、家屬關係、習俗和道德都已蕩然無存，人們唯一的想法是要吃飯，飢餓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九歲男孩賣四百元，四歲男孩賣兩百元，姑娘賣到妓院，小伙子往往被抓丁。抓丁是小伙子所歡迎的，因爲那里有飯吃。如我的花爪舅舅。

四、狗吃人情況。由于沿途死人過多，天氣又冷，人飢餓無力氣挖坑，大批屍體暴尸野外，這給飢餓的狗提供了食品。可以說，在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災區，狗比人舒服，這是狗的世界。白修德親眼看到，出洛陽往東，不到一個小時，有一具躺在雪地的女尸，女尸似乎還很年輕，野狗和飛鷹，正準備瓜分她的屍體。沿途有許許多多像災民一樣多的野狗，都逐漸恢復了狼的本性，它們吃得膘肥肉厚。野地里到處

是尸體，爲它們的生存與繁殖提供了食物場。有的尸體已被埋葬了，野狗還能從沙土堆里把尸體扒出來。狗可能還對尸體挑挑揀揀。挑那些年輕的、口嫩的、女性溫柔的。有的尸體已被吃掉一半，有的腦袋上的頭肉也被啃得一乾二淨，祇剩下一個骷髏。白將這種情況，拍了不少照片。這些照片，對日後的沒被狗吃仍活著的災民，倒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人吃人情況。人也恢復了狼的本性。當世界上再無什麼可吃的時候，人就像狗一樣會去吃人。白說，在此之前，他從未看到過任何人爲了吃肉而殺死另一個人，這次河南之行，使他大開眼界，從此相信人吃人在世界上確有其事。如果人肉是從死人身上取下的倒可以理解，反正狗吃是吃，人吃也是吃；但情況往往是活人吃活人，親人吃親人，人自我凶殘到什麼程度？白見到，一個母親把她兩歲的孩子煮吃了；一個父親爲了自己活命，把他兩個孩子勒死然後將肉煮吃了。一個八歲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湯恩伯的部隊，部

隊硬要一家農民收容弃兒。後來這個孩子不見了。經調查，在那家農戶的茅屋旁邊的大壇子里，發現了這孩子的骨頭；骨頭上的肉，被啃得干干淨淨。還有易子而食的，易妻而食的。——寫到這裡，我覺得這些人不去當土匪，不去合伙謀殺，不去組成三凶黨，不去成立恐怖組織，實在辜負了他們吃人吃親人吃孩子的勇氣。從這點出發，我對地主分子范克儉舅舅氣憤敘述的一幫沒有逃荒的災民揭竿而起，占据他家小樓，招兵買馬，整日殺豬宰羊的情形，感到由衷地歡欣和敬佩。一個不會揭竿而起祇會在親人間相互殘食的民族，是沒有任何希望的。雖然這些土匪，被人用沾油的高粱秆給燒死了。他們的領頭人叫毋得安。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四

《大公報》被停刊三天。《大公報》停刊不怪《大公報》，全怪我故鄉三千万灾民不爭氣。這些灾民中間，當然包括我姥娘一家，我二姥娘一家，我三姥娘一家，逃難的和留下的，餓死的和造反的，被狗吃的或被人吃的。雖然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大公報》。《大公報》重慶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刊載了他們在灾難中的各種遭遇。這激怒了委員長，于是下令停刊三天。當然，《大公報》這麼做，一半是爲了捕捉新聞，一半是出自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的被統治地位所帶來的對勞苦大眾的同情感。也許還有上層政治鬥爭牽涉到里面？這就不得而知了。他們派往灾區的記者叫張高峰。張高峰其人的個人歷史、遭遇、悲歡，他的性格、爲人及社會關係，雖然我很感興趣，但根據我手頭的資料，已無從考察，不過從文章中所反映出的個人品格，不失爲一個素質優良、大概人到中年的男性。他在河南跑了許多地方，寫了一篇前邊曾引述過的《豫灾實錄》，這篇稿子共六千字左右。沒想到這六千字的文章，竟在偌大一個中國引起麻煩。麻煩的根本原因，是因爲這六千字里寫了三千万人的真實情況。其實三千万人每個人的遭遇都可以寫上几万字、几十万字，他祇寫了六千字，六千字除以三千万，每人才平均0.0002個字，這接近于0，等于沒寫。這竟引起了几億人的委員長大發肝火。大發肝火的原因，許多人把其歸罪于蔣的官僚主義。但如前所述，

蔣絕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頭還有許多比這重大得多的國際國內政治問題。他不願讓三千万灾民這樣一件小事去影響他的頭腦。三千万灾民不會影響他的統治，而重大問題的任何一個細枝末節處理不當，他都可能地位不穩甚至下台；輕重緩急，他心中自有掂量，絕不是我們這些書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三千万里死了三百万，十個里邊才死了一個，死了還會生，生生死死，無法窮盡，何必操心？這是蔣委員長對《大公報》不滿的根本點，也是這起新聞事件的症結。悲劇在于，雙方仍存在誤會。寫文章的仍認爲是委員長不了解實情，不實事求是；委員長一腔怒火，又不好明發出來，于是祇好把復雜的事情簡單處理：下令停刊。

《豫灾實錄》里除了描述灾區人民的苦難，還同樣如《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那樣，寫了逃出灾區的灾民的路上情況。兩相對照，我們就可以相信這場灾難與灾民逃竄是真實的了。他寫道，順著隴海綫逃往到陝西的灾民成千上万，扒上火車的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者是家常便飯。因爲扒火車，父子姑嫂常被截爲兩伙，又遭到骨肉分離之苦。人人成了一副生理骨骼掛圖。沒扒火車步行逃難的，扶老携幼，獨輪車父推子拉，六七十歲的老夫妻喘喘地負荷而行。“老爺，五天沒吃東西啦！”他寫道：

我緊閉起眼睛，靜聽著路旁吱吱的獨輪車聲，像壓在我的身上一樣。

他還寫到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

情形當然都是真實的。如果祇是真實的情況，《大公報》也不會停刊。要命的是在二月一日刊載了這篇“實錄”之后，二月二日，《大公報》主編王芸生，又根據這篇“實錄”，結合政府對災區的態度，寫了一篇述評刊出，題目是《看重慶，念中原》，這才徹底打亂了蔣的思路，或者說，戳到了他的痛處，于是發火。

這篇述評說：

△ 昨日本報登載一篇《豫災實錄》，想讀者都已看到了。讀了那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泪。河南災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慘，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畢竟重到什麼程度，慘到什麼情形，大家就很模糊了。誰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飢餓死亡的地獄。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離子散，擠人叢，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賑濟委員會的登記證。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啃干樹皮的忍不住刺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够換到几斗糧食。這慘絕人寰的描寫，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 尤其令人不忍的，災荒如此，糧課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捐，餓著肚皮納糧，賣了田納糧。憶舊時讀杜甫所

咏嘆的《石壕吏》輒爲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見到今日的事實。今天報載中央社魯山電，謂“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糧征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所謂：“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征購情形極爲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泪之筆。

文章接下去描寫重慶物價跳漲，市場搶購，限價無限，而闊人豪奢的情況。然後說：

△ 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爲什麼政府就不可以征發豪商巨富的資產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万千。

這篇社評發表的當天，委員長就看到了。當晚，新聞檢查所派人送來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限令《大公報》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報》于是二月三、四、五日停刊了三天。

對於王芸生其人，我也像對張高峰一樣不甚了了。但從現有資料看，其人在當時與當局似過從甚密，與蔣的貼身人物陳布雷甚至蔣本人都有交往。但可以肯定，他畢竟祇是一個辦報的，并不理解委員長的

處境和內心。不過對他寫社評的這種稍含幼稚的勇氣，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能不佩服。要命的是，《大公報》被停刊，王芸生感到很不理解，他認為，這篇文章不過盡寫實任務之百一，為什麼竟觸怒委員長了呢？委員長提倡“民主”和“自由”，這不和他的口號相違背、公開壓迫輿論了嗎？為此，王芸生向陳布雷詢問究竟，陳說了一段我們前邊曾引述過的一段話。由于陳是蔣的貼身人物（侍衛室二組組長），這段話值得再引述一遍，由此可看出蔣的孤獨和為難：

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報。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并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

可見連陳布雷也蒙在鼓里。陳的一番話，說得王芸生直眨巴眼。就像螺絲與螺母不但型號不同，連形狀都不同所以根本無法對接一樣，王芸生怪委員長不恤民命，其實責任不在蔣一方，而是王芸生不懂委員長的心。反過來，蔣心里對王肯定是極大的蔑視與看不起，怪他幼稚，不懂事，出門做事不令人放心。因此，在這篇社評發表之前，一九四二年末，美國國務院戰時情報局曾約定邀請王芸生訪美。經政府同意，發了護照，買了外匯，蔣介石宋美齡還為王芸生餞了行。飛機行期已定，這時王讀到張高峰的報道，寫了《看重慶，念中原》這篇文章。距出發的前兩天，王芸生接到國民党中央宣傳部長張道藩的電話，說：

“委員長叫我通知你，請你不要到美國去了。”

于是，王芸生的美國之行就作罷了。王、蔣之間，雙方在不同層次、不同水平、不同想法之下，打了一場外人看來還很熱鬧、令人很義憤其實非常好笑和不得要領的交手仗。

可以肯定地說，《大公報》的災區報道和社評，並沒有改變蔣對災區的已定的深思熟慮的看法和態度。采取的辦法就是打板子、停報。知道這是從古到今對付文人的最好辦法。文人的骨頭是容易打斷的。板子打了也就打了，報停了也就停了，美國之行不准也就不准了，接下去不會產生什麼后果，唯一的效果是他們該老實了。所以，我與我故鄉的三千万災民，並不對張高峰的報道與王芸生的社評與呼喊表示任何感謝。因為他們這種呼喊并不起任何作用，惹怒委員長，甚至還起反面作用。我們可以為開他們，我們應該感謝的是洋人，是那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大災荒中，真給我們這些窮人幫了忙。所謂幫忙，是因為這些幫忙起了作用，不起作用的幫忙祇會給我們增加由希望再到失望的一個新的折磨過程。這也是委員長對待不同人所採取的不同態度。這說明蔣也不是一個過于固執的人，他也是可以變通的。對待國人，大家是他的治下，全國有万万治下，得罪一個兩個，槍斃一個兩個，都不影響大局；書生總認為自己比災民地位高，其實在一國之尊委員長心中，即使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對待洋人就不同，洋人是一個頂一個的人，開罪一個洋人，就可能跟著開罪這個洋人的政府，所以得小心對待——這是在人與政府關係上，中國與外國的區

別。白修德作爲一個美國知識分子吧，看到“哀鴻遍野”，也激起了和中國知識分子相同的同情心與憤怒，也發了文章，不過不是發在中國，而是發到美國。文章發在美國，與發在中國就又有所不同。發在中國，委員長可以停刊；發在《時代》周刊，委員長如何讓《時代》周刊停刊呢？白修德明確地說，如果不是美國新聞界行動起來，河南仍作爲無政府狀態繼續存在。美國人幫了我們大忙。當我們後來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時，我想不應該忘記歷史，起碼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這兩年不要打倒。白修德在災區跑了一圈后，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災區的消息發出去。所以在歸途中的第一個電報局——洛陽電報局——就草草地發了電稿。按照當時重慶政府的規定，新聞報道是要通過中宣部檢查的。如果一經檢查，這篇報道肯定會被扣壓；然而，這封電報却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台迅速發往了紐約。或者是因爲這個電台的制度不嚴（對於一個專制國家來說，制度不嚴也不失爲一個好事），或者是因爲洛陽電報局某一位報務員良心發現，這篇報道不經檢查就到達了紐約。于是，消息就通過《時代》雜誌傳開了。宋美齡女士當時正在美進行那次出名的訪問。當她看到這篇英文報道后，十分惱火；也是一時心急疏忽，竟在美國用起了中國的辦法，要求《時代》周刊的發行人亨利·盧斯把白修德解職。當然，她的這種中國式的要求，理所當然地被亨利·盧斯拒絕了。那里畢竟是個新聞自由的國度啊。別說宋美齡，就是揭了羅斯福的丑聞，羅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記者的做法，也不一定會被《時代》周刊當回事。須知，羅當總統才幾年？《時代》周刊發行多少年了？當然，我想羅夫人也不會這麼蠢，

也不會產生這麼動不動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念頭。

一夜之間，白修德在重慶成了一個引起爭論的人物。一些官員指責他逃避新聞檢查；另一些官員指控他與電報局里的共產黨員密謀。但不管怎樣，他們都對白修德奈何不得，這是問題的關鍵。這時，白修德已通過美國陸軍情報機構把情況報告了史迪威。也報告了美國駐華大使館。還報告了中國的國防部長。還見到了中國的立法院院長，四川省主席，孫中山博士的遺孀宋慶齡——白修德這樣廣泛地動員社會力量，是任何一個中國記者或報紙主編都難以辦到的。

中國國防部長的態度是：

“白修德先生，如果不是你在說謊，就是別人在對你說謊！”

立法院長、四川省主席都告誡白修德，找他們這些人是白找，祇有蔣介石說話，才能起作用，中國大地上才能看到行動。

但見蔣是不容易的。通過宋慶齡的幫助，花了五天時間，白修德才見到蔣。如果沒有孫的夫人、蔣的親屬幫忙，一切就要拉吹（所以，在專制制度下，裙帶關係也不一定全是不正之風，有時也是爲民請命之風）。據白修德印象，孫夫人風姿優雅、秀麗。她說：

“據悉，他（蔣介石）在長時間單調的外出視察后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天。但我堅持說，此事關係到幾百萬的生命問題

……我建議你向他報告情況時要像你向我報告時那樣坦率無畏。如果說一定要有人人頭落地的話，也不要畏縮。……否則，情況就不會有所改變。”

蔣介石在他那間陰暗的辦公室接見了白修德，見面時直挺著瘦長的身子，面色嚴峻，呆板地與白修德握了握手，然後坐在高靠背的椅子上，聽白修德談話。白修德記載，蔣在聽白修德申訴時，帶著明顯的厭惡神情。白修德把這理解成蔣的不願相信，這說明白修德與中國文人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沒有站在同一層次上對話。他們把蔣理解得膚淺得多。蔣怎麼會不相信呢？蔣肯定比白更早更詳細地知道河南災區的情況，無非，這並不是他手頭的重要事情。現在一些低等官員、中國文人、外國記者，硬要把他們認為重要其實並不重要的事情當做重要的事情強加在他頭上，或者說把局部重要的事情當成全局重要的事情強加在他頭上，不答應就不罷休，還把文章從國內登到國外，造成了世界輿論，把不重要的局部的事情真鬧成了重要的全局的事情，使得他把對他來講更重要的事情放到一邊，來聽一個愛管閑事的外國人向他講述中國的情況，真是荒唐，讓人又好氣又好笑；好比一個大鵬，看蓬間雀在那里折騰，而且真把自己折騰進去，扯到一堆草和亂麻之中時的心情。他不知為什麼這麼多雙不同形狀、不同膚色的手，都要插到這狗屎堆里。這才是他臉上所露出的厭惡表情的真正含義。這含義是白修德所不理解的，一直誤會了五十年。人與人之間，是多麼難以溝通啊。蔣聽得無聊，祇好沒話找話，對他的一個助手說：

“他們（指災區老百姓）看到外國人，什麼話都會講。”

白修德接下去寫道：

顯然，他並不知道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情。

這就是白修德的自作聰明和誤會之處了。不過中國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如果不誤會，白修德就沒有這麼大的義憤，沒有這麼大的義憤，就不會直逼蔣介石；而這種誤會和直逼，還真把這麼大智能大聰明整天考慮大事的蔣給逼到了牆角。因為問題在於：蔣一切明白，但他身有大事；可他作為一國之君，又不能把三千万這個小事當做小事說出來；如果說出來，他成了什麼形象？這是蔣的難言之隱。而白修德的直逼，正逼在蔣的難言之隱上，所以蔣也是哭笑不得，而白也真把蔣當做不了解情況。白找到這樣一個談話的突破口，即說河南災區在發生人吃人的情況。蔣聽到這個消息，也以爲白修德這樣的美國人不會親自吃苦到災區跑那麼多地方，見那麼多事情，估計也是走馬觀花，胡亂聽了幾耳朵，於是趕忙否認，說：

“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國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說：

“我親眼看到狗吃人！”

蔣又趕忙否認：

“這是不可能的！”

這時白修德便將等候在接待室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叫了進來，將他們在河南災區拍的照片，攤到了委員長面前。几張照片清楚地表明，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來的尸體上。這下將蔣委員長震住了。白修德寫到，“他看到委員長的兩膝輕微地哆嗦起來，那是一種神經性的痙攣”。我想，這時的委員長首先是惱怒，對白修德及福爾曼的惱怒，對災區的惱怒，對各級官員的惱怒，對這不重要事情的惱怒，對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惱怒，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這些本來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他也可以動員全國人民一起抗災，到災區視察、慰問，落下一個愛民如子的好印象。但他又不能把這一切惱怒發泄出來，特別不能當著外國記者發泄出來。于是祇好對著真被外國人搞到的狗吃人的照片痙攣、哆嗦，像所有的中國統治者一樣，一到這時候，出于戰略考慮，態度馬上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做出嚴肅的樣子，做出以前不了解情況現在終於了解情況還對提供情況人有些感激終於使他了解真相的樣子，馬上拿出小紙簿和毛筆，開始做記錄，讓白修德和福爾曼提供一些治災不力的官員的名字——這也是中國統治者對付事情的慣例，首先從組織措施上動刀子，接著還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要他們再寫一份完整的報告。然後，正式向他們表示感謝，說，他們是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調查員”都要好的調查員。接著，二十分鐘的會見就結束了，白修德和福爾曼被客客氣氣地送出去了。

我想，白二人走后，蔣一定摔了一紙

杯子，罵了一句現在電影上常見的話：

“娘希匹！”

很快，由于一張狗吃人的照片，人頭開始像宋慶齡預料地那樣落地了。不過是以給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國傳稿的洛陽電報局那些不幸的人開始的。因為他們讓河南餓死人那樣令人難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國。但是，也有許多生命得救了。白修德寫道：是美國報界的力量救了他們。白寫這句話時，一定洋洋自得；我引述這句話時，心里却感到好笑。不過，別管什麼力量，到底把委員長說服了，委員長動作了；委員長一動作，許多生命就得救了。誰是我們的救星呢？誰是災民的救星呢？說到底，還是一國之尊的委員長啊。雖然這種動作是陰差陽錯、萬般誤會導致的。但白修德由于不通中國國情，仍把一切功勞攬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即使美國報界厲害，但那祇是誘因，不是結果；對於中國，美國報界畢竟抵不過委員長啊。但白洋洋自得，包括那些在華的外國主教。白修德這時在重慶收到美國主教托馬斯·梅甘從洛陽發來的一封信：

你回去發了電報以後，突然從陝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在洛陽，他們簡直來不及很快地把糧食卸下來。這是頭等的成績，至少說是棒球本壘打出的那種頭等成績。省政府忙了起來，在鄉間各處設立了粥站。他們真的在工作，並且做了一些事情。軍隊從大量的余糧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幫了不少忙。全國的確在忙著為災民募捐，現款源源不斷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來，上述四點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證實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災荒完全是人爲的，如果當局願意的話，他們隨時都有能力對災荒進行控制。你的訪問和對他們的責備，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使他們驚醒過來，開始履行職責，后來也確實做了一些事情。總之，祝願《時代》和《生活》雜誌發揮更大的影響，祝願《幸福》雜誌長壽、和平！這是了不起的！……在河南，老百姓將永遠把你銘記在心。有些人心憎愛分明十分舒暢地懷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齒，他們這樣做是不奇怪的。

五

河南開始救災。因為委員長動作了。委員長說要救災，當然就救災了。不過，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首起救災民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仍然是外國人。雖然我們討厭外國人，不想總感謝他們，但一到關鍵時候，他們還真來幫我們，讓我們怎麼辦呢？這時救災的概念，已不是整體的、宏觀的、從精神到物質的，僅僅是能填一下快餓死過去人的肚子，把人從生命死亡綫上往回拉一把。外國主教們——本來是來對我們進行精神侵略——在委員長動作之前，已經開始自我行動了。這個行動不牽涉任何政治動機，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純粹是從宗教教義出發。他們是受基督委派前來中國傳教的牧師，干的是慈善事業。這裡有美國人，也有歐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儘管美國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歐洲互相殘食，但他們的神父在我的故鄉却攜手共進，共同從事著慈善事業，在盡力救著我多得不可數計的鄉親的命。人在戰場上是對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鄉親面前，他們的心却相通了。從這一點上說，我的鄉親們也不能說餓死得全無價值。教會一般是設粥場；而有教會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如鄭州、洛陽等。我的幾個親戚，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都喝過美國、歐洲人在大鍋里熬制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就是在洛陽到粥場領粥的路上，被胡宗南將軍抓了壯丁的。慈善機構從哪里來的糧食熬粥呢？因為美國政府對蔣也不信任了，外來的救

濟物質都是通過傳教士實行發放的；而這些逃竄的中國災民，雖然大字不識，但也從本能出發，對本國政府失去信任，感到唯一的救星就是外國人、白人。白修德記載：

教士們祇是在必要時才離開他們的院子。因為唯有在大街上走著的一個白人才能給難民們帶來希望。他會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虛弱的婦女和兒童圍住。他們跪在地上，匍匐著，磕著頭，同時淒聲呼喊：“可憐可憐吧！”但他們懇求的實際上不過是一點食物。

讀到這裡，我一點不為我的鄉親臉紅。如果換了我，處在當時那樣的處境，我也寧願給洋人磕頭。教會院子周圍，到處是逃難的人群。傳教士一出院子，就被圍得水泄不通。鄉親們都聚集到外國人周圍了。我想這時如外國人振臂一呼，鄉親們肯定會跟他們揭竿而起，奮勇前進，視死如歸，再不會發生八國聯軍時抵抗外國人的情形了。兒童和婦女們，每日坐在教會門口；每天早晨，傳教士們必須把遺棄在教會門前的嬰兒送進臨時設立的孤兒院去撫養——連后代也托付給洋人了。唯有這些少數外國人，才使我的鄉親意識到生命是可貴的。我從發黃的五十年前的報紙上看到，一個外國天主教神父在談到設立粥場的動機時說：

至少要讓他們像人一樣死去。

教會還開辦了教會醫院。教會醫院里擠滿了可怕的腸胃病患者。疾病的起因是：他們都食用了污穢不堪的東西。許多難民在飢餓難當時，都拼命把泥土塞進嘴里，以此來裝填他們的肚子。醫院要救活這些人，

必須首先想辦法把泥土從這些人的肚子里掏出來。

教會還設立了孤兒院，用來收留父母餓死后留下的孩子。但這收留必須是秘密的。因為如大張旗鼓說要收留孩子，那天下的孤兒太多了；有些父母不死的，也把自己的孩子丟棄或倒賣了。外國人太少，中國孤兒太多；換言之，中國孩子想認外國人做爹的太多，外國人做爹也做不過來。一個資料這樣記載：

飢餓甚至毀滅了人類最起碼的感情：一對瘋狂的夫婦，爲了不讓孩子們跟他們一起出去，在他們外出尋找食物時，把他們的六個孩子全都捆綁在樹上；一位母親帶著一個嬰兒和兩個大一點的孩子外出討飯，艱難的長途跋涉使他們非常疲倦，母親坐在地上照料嬰兒，叫兩個大一些的孩子再走一個村子去尋找食物，等到兩個孩子回來，母親已經死了，嬰兒卻還在吸吮著死人的乳頭；有一對父母殺死了他們的兩個孩子，因為他們寧願這樣做也不願再聽到孩子乞求食物的哭叫聲。傳教士們盡力沿途收撿棄兒，但他們必須偷偷地做，因為這消息一經傳揚出去，立即就會有無數孩子被丟棄在他們的門口，使他們無法招架。

兒童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政府的晴雨表。就像如果兒童的書包過重、人爲規定的作業帶到家里還做不完壓得兒童喘不過氣，證明這個國家步履蹣跚一樣，如果一個政府在兒童一批批餓死它也聽任不管而推給外國人的話，這個政府到底還能存在多長時間，就值得懷疑了。連外國人都認爲，如果身體健康，中國的兒童是非常漂

亮的，他們的頭髮有著非常好看的自然光澤，他們那杏仁一樣的眼珠閃動著機靈的光芒。但是，現在這些干瘦、萎縮得就像稻草人似的孩子，在長眼睛的地方却祇有兩個充滿了膿液的裂口，飢餓使得他們腹部腫脹，寒冷干燥的氣候使得他們的皮膚干裂，他們的聲音枯竭，祇能發出乞討食物的微弱哀鳴。——這祇代表兒童本身嗎？不，也代表著國民政府。如果坐在黃山別墅的蔣委員長，是坐在這樣一群兒童的國民頭上，他的自信心難道不受影響嗎？他到羅斯福和丘吉爾面前，羅、邱能夠看得起他嗎？

畢竟，蔣還是人——說道誰還是個人這句話，每當我聽到這句話，譬如，一個妻子說丈夫或丈夫說妻子：“你也算個人！”我心里就感到莫大的悲哀。這是多麼輕蔑的話語！這是世界的末日！但蔣還是個人，當外國記者把一張狗吃人的照片擺在他面前時（多麼小的動因），他畢竟也要在外國人之後關心我故鄉三千万災民了。他在一批人頭落地後，也要救災了。即：中國也要救災了。但中國的救災與外國人的救災也有不同。外國人救災是出于作爲人的同情心、基督教義，不是羅斯福、丘吉爾、墨索里尼發怒後發的命令；中國沒有同情心，沒有宗教教義，（蔣爲什麼信基督教呢？純粹爲了結婚和性交或政治聯姻嗎？）有的祇是蔣的一個命令。——這是中西方的又一區別。

那麼中國政府又是怎麼救災的呢？我再引用几段資料。也許讀者對我不厭其煩地引征資料已經厭煩了，但沒有辦法，爲了保持歷史的真實性，就必須這麼做，煩也沒辦法，煩也不是我的責任，這不是寫

小說，這是朋友交給我的任務與我日常任務的最大區別。我也不想引用資料，資料束縛得我毫無自由，如縛著繩索。但我的朋友給我送了一大捆資料。我當時有些發怵：

“得看這麼多資料嗎？”

朋友：

“爲了防止你信馬由僵和瞎編！”

所以，我祇好引用這些資料。至于這些資料因爲朋友的原因過多地出現在我的文字里，請大家因爲我暗含委屈而能够原諒我。

中國政府在一九四三年救災的資料：

△ 委員長下達了救災的命令。

△ 但是，愚蠢和效率低下是救濟工作的特點。由于各地地方官員的行爲惡劣，可怕的悲劇甚至進一步惡化。

△ 本來，陝西省與河南省相毗鄰，陝西的糧食儲存較爲豐富，作爲一個强有力的政府，就應該下令立刻把糧食從陝西運到河南以避免災禍。然而，這樣一來便有利于河南而損害了陝西，就會破壞政府認爲必不可少的微妙的權勢平衡，而政府是不會答應的。（中

國歷來政治高于人，政治是誰創造的呢？創造政治爲了什麼呢？）此外，還可以從湖北運送糧食到河南，但是湖北的戰區司令長官不允許這樣做。

△ 救濟款送到河南的速度很慢。（紙幣有什麼用，當那里再無食物可以購買的話，款能吃嗎？）經過几個月，中央政府撥給的兩億元救濟款中祇有八千萬元運到了這里。甚至這些已經運到的錢也沒有發揮出救災作用。政府官員們把這筆錢存入省銀行，讓它生利息；同時又爲怎樣最有效地使用這筆錢爭吵不休。在一些地區，救濟款分配給了鬧飢荒的村莊。地方官員收到救濟款后，從中扣除農民所欠的稅款，農民實際能得到的沒有多少。就連國家銀行也從中漁利。中央政府撥出的救濟款都是面額爲一百元的鈔票。這樣的票面已經够小的了，因爲每磅小麥售價達十元至十八元。但是，當時的糧食囤積者拒絕人們以百元票面的鈔票購買糧食。要購買糧食的農民不得不把這鈔票兌換成五元和十元的鈔票，這就必須去中央銀行。國家銀行

在兌換時大打折扣，大鈔票兌換小鈔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續費。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糧食，然而直到三月份為止，政府祇供應了大約一萬袋大米和兩萬袋雜糧。從秋天起一直在挨餓的三千万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約祇有一磅糧食。

△（救災之時），農民們仍處在死亡之中，他們死在大路上、死在山區里、死在火車站旁、死在自己的泥棚內、死在荒蕪的田野中。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員都這麼黑心爛肺，看著人民死亡還在盤剝人民。也有良心發現，想為人民辦些好事或者想為自己樹碑立傳的人。我歷來認為，作為我們這些普通百姓，祇要能為我們辦些或大或小的好事，官員的動機我們是不追究的，僅是為了為人民服務也好，或是為了創造政績升官也好，或是為了向某個情人證明什麼也好，我們都不管，祇要為我們做好事。仁慈心腸的湯恩伯將軍就在這時站了出來，步洋人的後塵，學洋人的樣子，開辦了一個孤兒院，用來收留洋人收剩餘的孤兒。這是好事。湯將軍是好人。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孤兒院呢？白修德寫道：

在我的記憶中，中央政府湯恩伯將軍辦的孤兒院是一個臭氣熏天的地方。連陪同我們參觀的軍官也受不了這種惡臭，祇好抱歉地掏出手絹捂住鼻子，請原諒。孤

兒院所收容的都是被丟棄的嬰兒，四個一起放在搖籃里。放不進搖籃的干脆就放在稻草上。我記不得他們吃些什麼了。但是他們身上散發著嘔吐出來的污物和尿尿的臭氣。孩子死了，就抬出去埋掉。

就是這樣，我們仍說湯將軍好。因為湯將軍已是許多政府官員和將軍中最好的了。就是這樣的孤兒院，也比沒有孤兒院要好哇。

還有的好人在進行募捐和義演。所謂募捐和義演，就是在民間募捐，由演員義演，募得義演的錢，交給政府，由政府再去發放給災民。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民國日報》，在十一月份的報紙上，充斥了救災義演、救災音樂會、書畫義賣、某某捐款的報道。我所在家鄉縣的縣政府韓書記，就曾主持過一場義演。我相信，參加募捐和義演的人，心都是誠的，血都是熱的，血濃于水，流下不少同情我們的眼淚。但問題是，募捐和義演所得，並不能直接交到我們手中，而是要有組織地交給政府，由政府再有組織地分發給災民。這樣，中間就經過許多道政府機構——由省到縣，由縣到鄉，由鄉到村——的中間環節。這麼多道中間環節，就使我們很不放心了。中央政府的救濟款，還層層盤剝，放到銀行生利息，到了手中又讓大票兌小票，收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續費；這募捐和幾個演員賺得的錢，當經過他們手時，能安全迅速通達到我們這裡嗎？我們不放心哩。

這些就不說了。政府是爹娘，打罵克扣我們，就如同打掉我們的牙我們可以咽下；問題嚴重還在于，我們民間一些志人

志怪、有特殊才能的人，這時也站了出來。不過不是站到我們災民一邊——站在我們一邊對他有什麼用呢？而是站在政府一邊，替政府研究對付飢餓的辦法。如《河南民國日報》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載：

財政科員劉道基，目前已發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復雜的吃一次七天不餓，簡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餓。

任何一個中國人，五十年後，在讀到這條簡短消息時，我想情感都是很復雜的。看來不但政府依靠不得，連一個科員，我們自己的下層兄弟，也指望不得了。如這種發明是真實的，可行的，當然好；政府歡迎，不用再救災；我們也歡迎，不用再死人。不但當時的政府歡迎，在以後几十年的中國歷史上，餓死人的事也是不斷發生的，如有這種人工配制吃一次七天不餓的東西，中國千秋萬代可保太平。但這種配制沒有流傳到今天，可見當時它也祇是起了宣傳作用、穩定人心作用，並沒有救活我們一個人。也許劉道基先生是出于好心、同情心、耐心和細心，也許想借此升官，但不管他個人出于什麼動機，這配制也對我們無用。我們照常一天一天在餓死，死在大路上、田野中和火車站旁。

——這就是一九四三年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下的救災運動。如果用總結性的話說，這是一場鬧劇，一場祇起宣傳作用或者祇是做給世界看做給大家看做給洋人洋人政府看的一出鬧劇。委員長下令求災，但并無救災之心，他心里仍在考慮世界和國家大事，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這是出演鬧劇的症結。鬧劇中的角色林林總總，鬧劇

的承受者仍是我們災民。這使我不禁想起了毛澤東的一句話：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說：我們死不死，有誰來管？作為我們即將死去的災民，態度又是如何呢？《大公報》記者張高峰記載：

河南人是好漢子，眼看自己要餓死，還放出豪語來：“早死晚不死，早死早脫生！”

娘啊，多麼偉大的字眼！誰說我們的民族沒有宗教？誰說我們的民族沒有向心力，是一盤散沙？我想就是佛祖面臨這種情況，也不過說出這句話了。委員長為什麼信基督呢？基督教幫過你什麼？就幫助你找了一個老婆；而深入中國人靈魂深處的佛家教義，却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幫了你政治的大忙。

當然，在這場災難中，三千万河南人，并不是全餓死了，死的還是少數：三百万。十分之一。逃荒逃了三百万。剩下的河南人還有兩千多万。這不死的兩千多萬人，在指望什麼呢？政府指望不得，人指望不得，祇有盼望大旱後的土地，當然，土地上也充滿了苛捐雜稅和壓榨。但這畢竟是唯一可以指望的東西。據記載，大旱過後的一九四三年冬天（指年初的冬天），河南下了大雪；七月份又下了大雨。這是好兆頭。我們盼望在老天的關照下，夏秋兩季能有一個好收成。祇要有了可以裹腹的糧食，一切都好說，哪怕是一個充滿黑暗、丑惡、污穢和盤剝的政府，我們也可以容忍。我們相信，當時的國民政府，在這一點上，倒能與我們心心相通，希望老天開眼，大災過去，風調雨順，能有一個好收成。不然情況繼續下去，把人一批批全餓死了，政

府建在哪里呢？誰給政府中的首腦和各級官員提供溫暖的住處和可口的食物然後由他們的頭腦去想對付百姓的制度和辦法也就是政治呢？人都沒有了，它又去統治誰呢？但老天沒有買從政府到民衆兩千多万人的帳，一九四三年禍不單行，大旱之後，又來了蝗災。這更使我們這些災民的命運雪上加霜。

六

蝗灾發生于一九四三年秋天，關於蝗灾的描寫，我知道主編《百年災害史》的朋友另有安排，我這篇《溫故一九四二》，重點不在蝗蟲。關於蝗蟲，中國歷史上有更大規模的陣仗；另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正在描寫它們。但這並不影響我對它們的提及，因為我們分別描寫的是不同年代的蝗蟲。他寫的是一九二七年的山東的蝗蟲，我寫的是一九四二年生活在我故鄉的蝗蟲，蝗灾相似，蝗蟲不同。據俺姥娘說，一九四三年的蝗蟲個大，有綠色的（我想是年輕的），有黃色的（我想是長輩），成群結隊，遮天蔽日，像後來發生的太平洋戰爭或諾曼底登陸時的轟炸機機群一樣，老遠就聽到“嗡嗡”的聲音，說俯冲，大家都俯冲，覆蓋了一塊莊稼地；一個時辰，這塊莊稼地就沒有了。一九四三年的春天，風打麥，顆粒無收；秋天又遇到蝗蟲，灾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蝗蟲來了，人死了，正在繼續一批一批地死去。據俺爹俺姥娘講，蝗蟲不吃綠豆，不吃紅薯，不吃花生，不吃豇豆，吃豆子、玉米、高粱。爲了維護自己的生命，我故鄉還無死光的難民，與蝗蟲展開了大戰。政府我們沒辦法，它的盤剝和壓榨往往通過一架瘋狂運轉的機器，何況他們有槍；但蝗蟲我們可以面對面地與它作戰，且沒有謀反暴動的嫌疑。這是蝗蟲與政府的區別。

怎麼搏鬥？三種辦法：

一、把床單子綁在竹竿上揮舞，驅趕螞蚱。但這是損人利己的做法，你把螞蚱趕走，螞蚱不在你這塊田里，就跑到了別人的田里；何況你今天趕走，明天就又來了。

二、田與田之間挖大溝，阻擋螞蚱的前進。螞蚱吃完這塊地，向另一塊轉移時，要經過大溝，這時就用舂米的碓子砸螞蚱，把它們砸成爛泥；或用火燒；這種做法有些殘忍，但消滅蝗蟲較徹底；我想被鄉親們杵死的螞蚱，也一定像當年餓死的鄉親一樣多。

三、求神。我姥娘就到牛進寶的姑姑所設的香壇去燒過香，求神保護她的東家的土地不受螞蚱的侵害。但據資料表明，鄉親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白費。螞蚱太多，靠布單子，靠溝，靠神，都沒有解決問題，蝗蟲照樣吃了他們的大部分莊稼。灾民在一九四二年是灾民，到一九四三年仍是灾民。

自然的暴君，又開始搖撼河南農民的生命綫，旱灾燒死了他們的麥子，蝗蟲吃了

他們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們的蕎麥，最后的希望又隨著一棵棵垂斃的秋苗枯焦，把他們趕上死亡的路途。那時的河南人，十之八九困于飢餓中。

照此下去，我想我故鄉的河南人，總有一天會被餓死光。這是我們和我們的政府不願意看到的。後來事實證明，河南人沒有全部被餓死，很多人還流傳下來，繁衍生息，五十年后，儼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國第二大省。當時為什麼沒有死絕呢？是政府又採取什麼措施了嗎？不是。是蝗蟲又自動飛走了吧？不是。那是什麼？是日本人來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日本人在中國犯了滔天罪行，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我們與他們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災區，却是這些殺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鄉親的命。他們給我們發放了軍糧。我們吃了皇軍的軍糧，生命得以維持和壯大。當然，日本發軍糧的動機絕對是壞的，心不是好心，有戰略意圖，有政治陰謀，爲了收買民心，爲了占我們的土地，淪落我們河山，奸淫我們的妻女，但他們救了我們的命；話說回來，我們自己的政府，對待我們的災民，就沒有戰略意圖和政治陰謀嗎？他們對我們撒手不管。在這種情況下，爲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糧，是賣國，是漢奸，這個國又有什麼不可以賣的呢？有什麼可以留戀的呢？你們爲了同日軍作戰，爲了同共產黨作戰，爲了同盟國，爲了東南亞戰爭，爲了史迪威，對我們橫征暴斂，我們回過頭就支持日軍，支持侵略者侵略我們。所以，當時我的鄉親們，我的親戚朋友，爲日軍帶路的，給日

軍支前的，抬擔架的，甚至加入隊伍、幫助日軍去解除中國軍隊武裝的，不計其數。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漢奸，漢奸那麼多，遍地都是，我們都是漢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據資料記載，在河南戰役的幾個星期中，大約有五萬名中國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繳了械。我們完整地看一下資料：

一九四四年春天，日軍決定在河南省進行大掃蕩，以此爲他們在南方進行一次更大規模的攻勢作準備。河南戰區名義上的司令官是一位目光炯炯的人物，名叫蔣鼎文。在河南省內，他最拿手的好戲是在他的轄區內恐嚇行政官員。他曾責罵河南省主席，使這位主席在恐慌之中與他合作制定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剝奪了農民手中最後一點糧食。

日軍進攻河南時使用的兵力大約爲六萬人。日軍于四月中旬發起攻擊，勢如破竹地突破了中國軍隊的防綫。這些在災荒之年蹂躪糟蹋農民的中國軍隊，由于多年的懶散，它本身也處於病態，而且士氣非常低落。由于前綫的需要，也是爲了軍官們自己的私利，軍隊開始強行征用農民的耕牛以補充運輸工具。河南是小麥種植區，耕牛是農民的主要生產資料，強行征牛是農民不堪忍受的。

農民們一直等待著這個時機。連續幾個月以來，他們在災荒和軍隊殘忍的敲詐勒索之下，忍著痛苦的折磨。現在，他們不再忍受了。他們用獵槍、大刀和鐵耙把自己武裝起來。開始時他們祇是繳單個士兵的武器，最后發展到整連整連地解除軍隊的武裝。據估計，在河南戰役的幾個星期

中，大約有五万名中國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繳械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軍隊能維持三個月，那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整個農村處于武裝暴動的狀態，抵抗毫無希望。三個星期內，日軍就占領了他們的全部目標，通往南方的鐵路也落入日軍之手，三十万中國軍隊被殲滅了。

日本爲什麼用六万軍隊，就可以一舉殲滅三十万中國軍隊？在于他們發放軍糧，依靠了民衆。民衆是廣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們就是幫助了日本侵略者。漢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戰役之前采訪一位中國軍官，指責他們橫征暴斂時，這位軍官說：“老百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可是如果當兵的餓死了，日本就會接管這個國家。”這話我想對委員長的心思。當這問題擺在我們這些行將餓死的災民面前時，問題就變成：是寧肯餓死當中國鬼呢？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呢？我們選擇了后者。

這是我溫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結論。

附錄

溫故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時，除了這場大災荒，還有這些年代所發生的一些雜事。這些雜事中，最感興趣的，是從當時的《河南明國日報》上，看到兩則離異聲明。這證明大災荒祇是當年的主旋律，主旋律之下，仍有百花齊放的正常復雜的情感糾紛和日常生活。我們不能以偏概全，一葉知秋，瞎子摸象，讓巴掌山擋住眼。這就不全面了。我們不能祇看到大災荒，看不到人的全貌。從這一點說，我們對委員長的指責，也有些偏激了。另外，我們從這兩則離異聲明中，也可以看到時代的進步。下邊是全文：

緊要啓事

緣鄙人與馮氏結婚以來感情不和難以偕老經雙方同意自即日起業已離異從此男婚女嫁

各聽自便此啓

張蔭萍馮氏啓

聲明啓示

鄙人舊歷十二月初六日赴洛陽送貨鄙妻劉化許昌人該晚逃走將衣服被褥零碎物件完全帶走

至今數日音信全無如此人在外發生意外不明之事與鄙人無干自此以後脫離夫妻關係恐親友不明特此登報鄭重聲明偃師槐廟村中正西街門牌五號田光寅啓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北京十里堡

- 全書完 -

